

农民工的抗争行动及其对阶级形成的意义

——一个类型学的分析^①

刘建洲

摘要:“结构力量”与“结社力量”对农民工阶级形成历史进程中抗争行动的表现形式、内容及其性质,具有深远的影响。基于这一判断,本文根据组织化程度和抗争的性质初步构建了一个类型学框架,将农民工的抗争行动划分为四个类型;同时,结合具体的抗争案例,分析了这些初生的抗争行动对农民工阶级形成的可能意义。

关键词:农民工 抗争行动 类型学 阶级形成

一、农民工的抗争行动:一个类型学的分析框架

西尔弗在《劳工的力量》一书中曾指出:“埃里克·奥林·赖特关于结社力量(associational power)和结构力量(structural power)的区分,为区分工人谈判力量的不同类型,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出发点。所谓结社力量,是由于工人集体组织的形成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会和政党;与之相对应的所谓结构力量,简单说就是由工人在经济系统中所处的位置所产生的力量。”^②“结社力量”与“结构力量”这两个概念,为审视农民工群体的命运,为理解其阶级形成历史进程中阶级结构、阶级行动以及阶级形成(class formation)三者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Erik Olin Wright, 1978),提供了具有穿透力的理论透镜。

正如有关论者所指出,作为一个流变中的群体,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尚处于“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阶段(潘毅等,2009;潘毅、任焰,2008)。相应地,其抗争行动深受自身“结构力量”与“结社力量”发育现实的制约,尤其是国家的劳工政策、威权式、法团主义的干预措施,对其抗争行动的组织形式、行动目标与表现形式等,具有深远的影响:首先,在农民工的阶级形成过程中,“结社力量”的形成面临着其特殊的体制与制度困境。譬如:在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下,劳工的自由结社权被严格限制;国家、资本与劳工关系还难以真正通过市场机制和劳资博弈的方式来解决;强大的国家机器往往透过一些功能性利益代理组织(如党委、共青团和工会)来与社会中的主要团体或个人发生组合性政治关系。其次,在农民工阶级形成过程中,其“结构力量”与“结社力量”的展现并非是同步的。与“结构力量”的展现方式相比,农民工这样一个处于成长中的并正在展现出其“结构力量”的阶级(用脚投票而出现的“民工荒”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尽管这种“结构力量”的展现是通过消极的方式进行的),^③其“结社力量”的浮现面临更严峻的制约,其充分发育要经历更为漫长的历史进

^① 本论文是笔者主持的上海社科规划一般课题“农民工的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研究”(课题批准号2010BSH002)的部分成果,论文得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张敦福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闻翔等的批评与指正,特此致谢。

^② 赖特进一步将结构力量划分为两种亚类型:第一种亚类型谓之市场谈判力量(marketplace bargaining power),直接来源于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力量。第二种亚类型谓之工作场所谈判力量(workplace bargaining power),来源于在关键性工业部门工作的特定工人群体的战略性地位(参见 Beverly J. Silver, 2003; 奥林·赖特, 2006: 118 - 119)。

^③ 关于农民工的结构力量,学界关注甚少。事实上,随着农民工的分化,“结构力量”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中技术工人抗争的基础,并展示出了较强的抗争力量(华正新, 2009)。不过,该群体是成为“劳工贵族”或是在去技术化的生产过程中,变得像西欧早期劳工抗争中的富有战斗性“工匠”,则尚有待观察和进一步研究。

程;其具体表现形态、与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公民社会空间的拓展以及劳工抗争的历程等有着密切关联。最后,执政党对农民工阶级形成过程中“结构力量”的借用与应对策略,其所颁布的巩固党的群众基础的各种劳工政策,尤其是现有工会组织对农民工的吸纳与维权功能的介入,^①对内生的农民工组织(各种劳工 NGO)的发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②

有鉴于此,笔者根据组织化程度(细分为个体与集体两个维度)和抗争的性质(细分为积极抗争与消极抗争两个维度),尝试将初步萌发并可能迈向现代劳工集体行动的农民工抗争行动,划分为四个类型(参见表 1)。应该承认,相对于国外劳工史研究的深度和丰富性而言,本文的分析是初步的(Michael Hanagan, 2008; Ronald Aminzade, 1984: 437 - 453)。不过,本分析框架并非理想类型的划分,目的仅仅是通过该框架将见诸报刊、网络及学术调查研究中的各种农民工抗争行动进行类型学的区分;同时,通过对具体抗争个案和重大劳工抗争事件的分析,透视制约其抗争行动发育和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具体而言,表现为“结社力量”与“结构力量”在特定个案中的展现、生成与消解),分析农民工作为行动主体的抗争策略,尤其是这些初生的抗争行动对其阶级形成的可能意义。^③

表 1 农民工抗争行动的一个类型学框架

组织化程度 抗争的性质	个体	集体
消极	自杀式抗争,指向自身 (典型案例:富士康员工连环跳楼自杀事件)	“弱者的武器”式的抗争,指向劳工的基本经济权益,如工资等 (典型案例:“太太讨薪队”的维权行动;“隐藏文本”性质的日常抗争)
积极	暴力抗争,指向资本(雇主)一方 (典型案例:劳资冲突中的极端事件,如刘汉黄杀人案)	现代意义的劳工抗争,带有阶级取向的抗争的特点 (典型案例:南海本田汽车工人罢工)

二、农民工抗争行动的类型及其对阶级形成的意义

(一)消极的个体抗争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特别是 2000 年以来,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现象普遍,讨薪难成为社会热点,^④ 部分农民工诉诸以自残甚至跳楼、跳塔吊、服毒、自焚、剖腹等自杀手段。有学者将这一现

① 为了应对日益增多的劳资纠纷,2004 年全国总工会提出“组织起来,切实维权”。各地工会也开始探讨以适当的组织形式组织农民工,包括:(1)源头建会模式,即在农民工外出打工之前,先组建工会再外出打工,或者已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在自己的家乡所在地加入工会(以信阳模式为典型);(2)项目入会制,主要适用于建筑行业;(3)广覆盖式,建立楼宇、街道、社区、乡镇、村工会,通过完备的工会组织网络,吸纳零散就业的农民工入会(参见吴亚平, 2006)

② 譬如,著名的劳工 NGO“草根之家”以“格吸社区工会新杭州人志愿者服务站”的形式,被纳入到工会系统(参见区总工会、九堡镇总工会, 2010;亦可参见和经纬、黄培茹、黄慧, 2009)。

③ 本文关于抗争类型的划分,并非李连江等的“基于政策的反抗”或“合法抗争”的概念(参见 Lianjiang Li and Kevin J. O'Brien, 1996: 28 - 61),也没有采用于建嵘关于农民“以法抗争”和工人“依理维权”的分析框架(参见于建嵘, 2004)。本文的目的仅在于通过类型学建构,揭示农民工的抗争行动与“结社力量”和“结构力量”之间的关系,揭示这些行动在阶级形成中的意义。而关于中国劳工政治的模式划分,学界大多从地域着眼,较少从抗争的类型切入(参见 Marc Blecher, 2010: 92 - 111)。

④ 其高潮是 2003 年 10 月 24 日,中国总理温家宝亲自为一位重庆农民工讨回 2240 元工资。同时也揭开了全国工会为农民工讨薪的序幕。在工伤赔偿方面,则出现了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

象称为转型中国农民工的“以死抗争”。^① 为权利而自杀作为一种抗争策略,实际上折射了农民工的维权困境。作为一种策略性维权行为,它主要表现通过自杀姿态及其实践,为获得自身的权利和尊严,以不惜以身体和生命为赌注来对资方和政府进行威慑。尤其是爬塔吊自杀行为,因其所具有的公开性和表演性,能够传递和放大权利被侵害的信号,使公众和政府了解其冤屈从而引起关注,而成为农民工消极维权的象征性符号。

为权利而自杀的现象之所以频繁发生,并非简单的个人心理调适问题,而源于在“强政府、强资本、弱劳工”的严峻现实下,农民工作为正在崛起的劳工的各种权利,受到了极度的侵害。这种消极的个体抗争行为,对政府主导的关于农民工的意识形态话语,产生了很大的消解作用。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治理逻辑下,这种抗争符号与事实,无疑彰显着“社会不和谐因素”的存在,给政府有关方面(尤其是工会和劳动监察部门)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对资方而言,指向自身的自杀行为尤其是连环自杀行为(其中的典型个案,当属富士康员工连环跳楼自杀事件),更会激发社会各方关于劳工权利、“血汗工厂”的声讨;对劳工群体尤其是觉醒的大学生群体而言,则会产生一种“物伤其类,心有戚戚”的原始的阶级意识,尤其是在大学生成为“蚁族”和农民工失业问题叠加之际。消极的抗争,往往会产生深远的积极意义。从潜功能的角度来看,某些重大的、指向自身的消极抗争“事件”,在特定的历史时刻为农民工的阶级形成,提供某种社会反思与资源动员的契机。例如,富士康频发员工自杀跳楼事件后,一篇来自劳工 NGO 网站的题为《重提“丧钟为谁而鸣”》的网文反思道:

“韩国的美丽青年全泰壹自焚了,但此后的 30 年间,却有大量的韩国大学生进入劳工领域,与劳工结合开展工人教育,并直接推动了韩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只有投入底层人民的运动之中,我们(大学生)才能找到人生的价值和方向,我们才不会堕入资本的“空洞”之中。……只有真正深入到底层的生活,你才不会觉得自己活在虚无之中,无所适从。”^②

在 2010 年 5 月 28 日晚,北京的新工人艺术团举办了一场题为“生命尊严——悼念富士康工友”的民谣义演活动,来发出新工人群体自己的声音,寄托哀思。百余名在京打工者、群众、学生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自发赶到位于朝阳区金盏乡皮村的新工人剧场,悼念富士康死难工友。主办方负责人孙恒这样呼吁,“这次活动主要是悼念富士康死难的工友,关注他们就是关注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去反思背后真正的原因,那么下一个悲剧也许就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的声音虽然微弱,力量虽然很小,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再保持沉默,我们必须发出我们工人自己的声音,表明我们的态度和立场,去反思悲剧背后的社会问题,全社会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用自己的方式行动起来。”^③在义演现场,新工人艺术团演出了反映打工生活的民谣歌曲和戏剧,很多工友朗诵了他们专门为悼念富士康工友写的诗歌。一名署名为“小小”的工友,在《悼念富士康工友烈士》的诗中如是写道:

“收音机里\耳畔音乐袅袅\电视机里\眼前画面美好\你我身边有着和谐的外表\遮掩着资本丑恶的心跳\心灵的丑恶难以掩盖\盛世的外衣裹得严严……跳\我用生命让你停止欢笑\跳\我用生命让流水线停掉\跳\我用生命向世人宣告\跳\我用生命抗议这世道\跳\我用生命把你的外衣剥掉\跳\我用生命让血腥的你被人看到\跳\我用生命诠释人

① 其中的一个较为全面的研究,参见徐昕(2008:255-305)。

② 该文的题记为:“谨以此文献给逝去的以及仍在流水线上为资本增值而不停运转的螺丝钉们,同时也献给我们自己,献给可以预见却又未知的命运……”。参见大工地博客 <http://dagongdi.blog.163.com/blog/static/112224248201042610147217/>。

③ 《北京新工人悼念富士康工友》,参见 <http://www.dashengchang.org.cn/Article/ShowInfo.asp?ID=264>。(该网页已经被删除——作者注)

的需要\跳\我用生命唤醒人们别被麻醉倒\跳跳跳\我们用生命挖出通向深处的通道\跳\我用生命寻找人的尊严。”^①

以富士康员工连环跳楼事件为代表的消极抗争行为,是否具有像全泰壹的自焚那样引发劳工团结和劳工运动的效应,^② 是否具有促使政府反思自身威权主义劳工政策以及对工人的结社力量加以法团主义控制弊端的效果,是否具有警醒资方正视农民工阶级意识通过自杀抗争的形式进行表达的现实,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③但有一点是无疑的:这些消极的个体抗争行为,一旦被置于一些列的“事件”之中,就具备着与个体原子化抗争^④ 不同的裂变式的重大社会效应和历史意义;它折射出农民工阶级形成中的各种结构性障碍,启发各方行动者从该事件中反思制约农民工阶级形成的社会结构,以及这些特殊的抗争行动所具有潜在的、尚待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展现的积极意义。

(二)积极的个体抗争

与消极的个体抗争不同,积极的个体抗争往往指向资方或其代理人,带有“以血还血”的原始道义色彩,尽管这些抗争在本质上不过是劳资冲突的一种畸变形式。之所以将这类抗争界定为积极的个体抗争,是因为:其一,这类案例促使人们反思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劳工抗争的正常表达——集体罢工或者是劳工的正常维权——在当下的阶级形成过程中,却演变成“一个工人对另一个资本家的战争”?其二,这些抗争的主人公的最终命运往往带有极强烈的悲剧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尤其是对实施积极个体抗争的劳工命运的声援与支持。^⑤ 最后,这些积极的个体抗争,虽然并未导致其所在群体命运的结构性的改变,个人命运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张力依然存在,但个体生命的消逝或命运的沉浮,面对劳工的结构性的问题的汪洋大海,却不仅仅意味着片片涟漪,也暗示着死水中的微澜,从另一个侧面构成了促成农民工阶级意识发育的契机。限于篇幅,本文选择刘汉黄事件作为其中的典型个案加以简要分析。^⑥

这一事件其实并不复杂:刘汉黄是台商工厂展明五金厂工人,2008年8月进厂工作,9月在操控机器时,不小心把右手轧伤,最后不得不将整个右手掌切除。出院后经仲裁处仲裁,工厂赔偿18万元,但工厂只同意赔偿9万元。刘曾于2009年6月13日爬上工厂五楼欲跳楼。最终,他于6月15日在展明五金厂门口手持弹簧刀杀死了三名台商。刘汉黄事件发生之后,台湾数十家劳工团体参与救援刘汉黄的联署,十多家团体更是直接组成“救援职灾工人刘汉黄联盟”,向有关方面请愿,

① 《北京新工人悼念富士康工友》,参见 <http://www.dashengchang.org.cn/Article/ShowInfo.asp?ID=264>。(该网页已经被删除——作者注)

② 关于全泰壹的自焚对韩国劳工运动的深远影响,参见刘开明(2005)。

③ 李昌平在题为《漠视今天的“生不如死”,必有明天的“拼死一搏”——为富士康工人哭,为中国哭》的反思文章中指出:“‘十三跳’之后,如果‘血线’下的人有增无减,一定还会有‘生不如死’的‘十四跳’、‘十五跳’……,但也一定会有工人阶级为新生而‘拼死一搏’的惊险飞跃!”参见 <http://www.snzg.net/article/show.php?itemid-18938/page-1.html>。(该网页已经被删除——作者注)

④ 潘毅对一种抗争文体(a resistance genre)——当前中国经济特区工厂生活中的尖叫和梦魇——的描述和分析表明:处于底层的打工妹,尽管被资本主义、现行体制以及当地男性文化的势力撕裂而产生强烈的实体痛楚,但面对强大的社会,面对纪律监管的力量,还是能够通过工厂中的种种慢性痛楚来加以反抗(参见潘毅,1999)。

⑤ 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刘汉黄故意杀人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刘汉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三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合共人民币一百二十多万元(人民币)。之后,刘汉黄本人提出要求上诉。2010年4月23日,刘汉黄案二审维持原判。值得关注的是,刘汉黄案件并非孤立的个案,在此前的2009年3月12日,在杀死公司的一名人事总监和一名人事经理之后,24岁的广州番禺区嘉衡珠宝公司起版部工人何金喜抛下怀孕7个月的妻子,从公司顶楼跳下身亡(相关报道参见李军,2009)。吊诡的是,同年7月24日,国有企业通钢职工因不满建龙集团增资扩股,建龙集团派出的总经理陈国军被工人群众殴致死。这些“劳工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⑥ 近年来,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类似事件,还包括农民工“王斌余杀人案”、“阿星杀人事件”等。

为刘汉黄的生命权疾呼。大陆的一些劳工草根组织,也借助网络,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网络声援行动募捐行动。^①一些普通工友,发来联名声援信,对刘汉黄表示同情与声援。顺德奥讯电子工友联名声援刘汉黄的题名为《工人帮工人,声援刘汉黄》联名信这样写道:

“我们来自四面八方,是珠三角庞大民工兵团中的一员。我们与刘汉黄素不相识,与展明公司老板无冤无仇。当我们从报纸上、在网络上看到刘汉黄事件时,对刘汉黄的遭遇深表同情,对展明公司漠视工人苦难无比愤慨。刘汉黄赖以生存的右手被机器压断截肢,没有办法找工,没有劳动能力,生活被逼入绝境。然而展明公司不但拒绝法院的17万元赔偿判决,为了逼刘汉黄接受较低数额的赔偿,进行辱骂、殴打、驱逐,难道公司为了赚钱,连做人的良心都可以不要吗?……我们要求法院重视民情民意,为工人撑腰,对刘汉黄案公开审理,公开辩护,并强制执行展明公司对刘汉黄的工伤赔偿。并对刘汉黄从轻量刑。”^②

从刘汉黄事件所激发的劳工声援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尤其是政府各方的作为来看,该事件明显折射出社会主义国家新工人阶级形成中的困境与两难:在抗争的一方,是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游环节中的台资厂商;另一方,则是从农村到工厂的、缺乏抗争组织、手段与资源的原子化的新兴劳工。在各方的压力下,且出于对社会道义与“依法治国”逻辑的考量,政府有关方面通过处理刑事案件的手段来对该事件加以处理。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显然也是捉襟见肘的。因为这种做法,是对劳工结构性力量成长与“结社力量”生成要求的漠视,更是对劳资结构性冲突生成根源的漠视。这和富士康劳工连环跳楼事件中,公司方希望通过心理干预机制乃至“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祈愿活动来防止劳工的自杀一样,实际上是对劳工问题的遮蔽而非直面如何从结构上解决劳工问题。但是,和消极的个体抗争一样,积极的个体抗争虽然具有其悲剧性的一面,却能够激发工人对共同处境与命运的思考。从工友以及各劳工NGO的声援话语来看,打工阶级的阶级意识在这些事件中得到了萌生的契机。^③

(三)消极的集体抗争

尽管已经被意识形态纳入“产业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农民工无法承继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工人的阶级认同,其基于自身权益而进行的诉求,很难从旧有话语中得到表达。在离开社会主义父爱传统的生产体制后,生存伦理支配着农民工的抗争方式,广泛存在的抗争行动仍带有“弱者的武器”的性质(黄岩,2009)。而弱者之所以具有抗争的可能,是因为他们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力量:其一,从弱者身份来看,弱者具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其二,在弱者的身份上,弱者还蕴含着道德潜力;其三,从弱者抗争的行为来看,弱者抗争暗含着反抗不平等,其抗争行为带有某种伸张正义的意味;其四,从弱者抗争的安全性来看,弱者能够享受制度性或政策性庇护(董海军,2008)。

作为“弱者的武器”的抗争行动,其共同特点是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是其重要特点(郭于华,2002)。从功能上来看,这些消极的集体抗争,能够悄无声息地向资方传达出劳方的

① 更详尽的资料,参见工人论坛之“刘汉黄事件专题:捅杀台商,反抗压迫”,<http://bbs.chuizi.net/thread-3201-1-1.html>。亦可参见先锋工人网之“杀死无良台商的工伤工人刘汉黄事件全记录”<http://pioneer-worker.forums-free.com/topic-t562s10.html>。

② 参见 <http://bbs.chuizi.net/thread-3553-1-1.html>。

③ 譬如,一份为刘汉黄募捐的信,这样写到:“在资本家的重重压迫下,奋起反抗的工伤工人刘汉黄最终捅杀了直接压迫他的两名台商和重伤一名高管。……今天,我们将和刘汉黄站在一起共同面对资本家刁难的120万。……我与兄弟同在!我们呼吁,捐款救援行动不仅要继续,还要更上一层楼!救援的是生命,救援的是我们阶级感情的生命。生命绝不仅仅只是一份判决!团结更多的朋友用我们的行动表达出我们的声音:我们与刘汉黄一起承担!”转引自红花草工人服务网,<http://honghuacao.com/thread-298-1-1.html>。

不满并形成压力,迫使资方调整管理策略,从而成为看似波澜不惊的工场政治中不时泛起的微微涟漪。譬如,何明洁对餐饮业青年女性农民工研究表明,集体行动的缺场并不等于逆来顺受,她们依然能够以一种看似温和的日常化形式彰显出新生代独特的个性,表达中有反抗,反抗中有妥协,妥协中有寄望。她们或者以牺牲经济收入为代价,选择不签合同来维护自由劳动的姿态;在工作中她们不吝惜笑脸,但对不喜欢的人和事却保留了蔑视的态度;在更衣室这个混杂拥挤的特殊空间,其集体狂欢将其从出身相同、地位分级的现实中暂时释放出来,嬉笑怒骂成了不同工种、不同级别的农民的女儿交换意见、分享信息、表达感受的“隐藏的文本”;粗话和黄话充斥在工作场所,铿锵有力地宣泄着劳动者的不满,松弛或满足其疲惫身心下蕴藏的各种情绪需求(何明洁、古筝,2009)。

之所以将这类抗争归结为消极的集体抗争,是因为就农民工目前的“结社力量”而言,就抗争的制度空间与抗争的资源而言,公开的、有组织的积极抗争行动对他们来说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显得过于危险。因此,这里所谓的集体抗争,是就抗争的普遍性而言,而不是就抗争的组织形式而言。这里所谓的消极抗争,并非是说它们是无力的或没有功效(恰恰相反,大量的微不足道的小行动的聚集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日积月累地造就的珊瑚礁,最终可能导致国家航船的搁浅或倾覆),而是说在资方总体上占优势的劳动环境中(借助各地政府迎接产业梯度转移的大好良机而关闭工厂或转移工厂,是其惯用的方法),经济地位和社会身份处于双重弱势的农民工和斯科特笔下的马来西亚农民一样,面对支配性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显得无能为力。他们通常只能在个人层面、在日常生活中,对资方控制做出“防御性反应”,^①以确保在严密的管理规训中维持基本权益和尊严。与有纲领的、正式的反抗相比,这种“防御性反应”反抗是潜在的、个体性的,避免了高昂组织成本,被称为“隐藏的文本”。“隐藏的文本”虽然为他们创造并维持一个社会空间,在这一空间中权力关系表达的官方文本被从后台加以反对。但是,这种抗争并不足以改变劳工结社力量缺位的既有格局,而仅仅是集体性的劳工问题转化为个体性或某一群体的问题。^②

(四)积极的集体抗争

蔡禾在2006年进行的珠江三角洲企业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在遭受到利益侵害的农民工中,有28.2%的人通过行政投诉进行利益抗争,有24.8%的人通过集体行动进行利益抗争(蔡禾等,2009)。在抗争中,他们采用各种策略来确保行动的合法化和自身的安全,譬如寻求行动的合法性,迎合主流话语,进行框架连接;善用弱者武器,谋求道义上正当性;把行动控制在法律政策规定的框架内,做到踩线不越线(周林刚、冯建华,2009)。在积极的集体抗争中,最典型的抗争手段是罢工。^③陈敬慈和潘毅对深圳工业园区两家工厂的罢工行动(一家是台资工厂,罢工发生在2004年;一家是德资工厂,罢工发生在2007年)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无产阶级化过程促成了农民工的劳工抗争;这些集体抗争多数直接指向生产过程中的管理方;宿舍和工人社区,有利于他们克服单一工作场所中地域、性别和同辈群体等限制,组织起来进行集体抗争(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发动了跨越工厂的罢工行动)(任焰、潘毅,2006);正是在这些集体抗争行动中,他们形成了某种团结意识和对共同命运与共同利益的体认,形成了对外资的反抗情绪以及关于工人权利的话语(Chris Chan King Chi and Pun Ngai,2009:287-303;亦可参见Leung Pak Nang and Pun Ngai,2009:551-565)。

积极的集体抗争更多地成为第二代农民工(即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并于世纪之

① 斯科特认为农民的反抗行动是发生在其生存权利受到威胁之时。地主拿走了收成并不必然导致农民造反,但如果地主拿走的威胁到了他们的基本生活,农民就要揭竿而起了。斯科特将这种不以提升自己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旨在恢复其原有生存位置和公平理想的反抗称之为农民的“防御性反应”(James C.Scott,1990)。

② 其中的典型者,是“太太讨薪队”的维权行动(王伦刚,2009)

③ 1982年,中国修改颁布的新宪法取消了“罢工自由”这一款项。目前,罢工作为一种劳工抗争的基本权利并未获得认可。由于这种缺失,农民工在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时,对基于地缘关系、友情关系形成的非正式表达途径具有较高的认同度和效能感,而对正式利益表达途径缺乏认同和效能感;其农民工利益表达的行为选择同现有利益表达的制度供给之间存在明显的背离(王金红、黄振辉,2008)。

交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那部分打工者)的选择。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其工作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是他们也经历着更加显著的城乡分裂,更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更深刻的社会排斥。第二代农民工期待能把自己转变为在城市居住的工人,但横亘在他们眼前的,是存在巨大反差的社会现实。这种反差使他们感到愤怒、沮丧、怨恨,而这些主观体验则带来工人自我意识的出现,并促成其共同阶级认同的形成。如果说,上个世纪80、90年代以工厂女工为主体的农民工很少参加集体行动,只是在日常的工作过程中借助自己所能支配的躯体用无声的方式来表达反抗,那么,第二代农民工则不同,他们正在从沉默转向愤怒,从痛苦转向行动,从同意转向抗争(Pun Ngai and Lu Huilin, 2010: 493 - 519)。

这种积极的集体抗争行动,常常因日益积累的怨恨、集体利益认同的社会建构和被催化的次生怨恨,经过网络、精英和媒体的动员,充分利用当前政府有限度的容忍、管理资源与目标的紧张、条块利益的裂痕等政治机会,在政府行为的刺激和强化作用下而得以实现。从集体行动的发展过程看:在抗争的初期,怨恨的积累等心理因素的影响最明显(成伯清, 2009);在发展期,组织外精英介入的影响最明显;在高潮期,政府的刺激和强化作用最明显。由于农民工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工人,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农民,既不同于城市中的居民,又不同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其集体行动有着不同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理性行动与非理性行动并存、组织内动员与组织外动员结合、受政府影响与影响政府相依。强大权力和资本结盟,基层权威的丧失、利益表达机制的失灵、社会控制的失效,制度的逆向调节、衔接不够和约束无力,以及罢工权、自由结社权和集体谈判权缺失等制度安排,都促成着农民工集体行动的产生发展(冯建华, 2008)。

不过也要看到,农民工积极的集体抗争行动尚多停留在自己的工厂,斗争指向公司老板;抗争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工资过低、超时劳动以及工厂克扣工资等,其抗争诉求也限于“增加工资”、“改善伙食”等层面,且仅仅停留在车间政治的范围内,带有“基于利益的或阶级取向的”(interest - based or class - oriented)抗争的特点(Chan Wai Ling, Jenny, 2006; 胡美燕, 2008)。虽然工人的反抗意识完全可以借助于任何一个偶然性的事件而引爆其共同的不满情绪而爆发,^①虽然这种无意识的集体行动能够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群体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能获得有效的解决。此外,工人在集体行动中的联合、他们的斗争经验以及在斗争中形成的传统,还很难成长为“团结的文化”或“战斗的语言”(Marc W. Steinberg, 1999: 229 - 242),尚不能通过一种阶级联盟的形式传承下来,或者说通过结社力量的形式表现出来。农民工群体高度的流动性和地域差异,造成了其分裂,这种分裂严重影响了他们在斗争中的团结。即使有团结存在的话,这种团结是十分脆弱的。正如黄岩对台兴工厂工人抗争失败的原因分析所归纳的:由于无组织领导、无明确的斗争策略、缺乏团结的文化传统和外来的支持,工人的团结斗争尽管具备了诸多成熟的内部环境,但作为一种阶级的团结还只停留在萌芽状态中(黄岩, 2010)。

三、结语与讨论

在卡茨尼尔森等关于阶级形成的比较研究框架中,工人阶级的形成可以从四个层面展开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社会生活方式、文化意识倾向(culture disposition)以及雇佣工人的集体行动。其中,第一位经济因素指向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形式(建立在对生产工具没有控制权的雇佣工人的基础上),与无产阶级化过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第二位的社会层次,指向工人生活世界的经验性社会结构,它发生在工作与家庭当中;第三位的文化层次,力图把握工人所共享的意识倾向、价值标准;第四位的政治层次,所包含的则是工人集体行动的正式与非正式的路径(Ira Katznelson & Aristide R.

^① 在女工们的语言中,“忍”是经常挂在嘴边的。而“忍”是一个蓄积过程,是一个底线:在忍的一侧,是生存的文化+反抗的隐藏文本;超过了这个底线的另一侧,就可能是反抗的公开文本。而反抗者之间的关系,是集体行动的基础,是反抗行动的中介(谭深, <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article/2005/10/368.html>)。

Zolberg, 1986: 14)。参照这一分析框架,农民工的抗争行动及其类型的分析,从属于阶级形成的第四个层次。

“结社力量”与“结构力量”作为两个具有启发性的概念,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分析和理解农民工在抗争行动中调用资源并最终转化为行动的过程。尤其基于这两个概念建构一个分析框架对农民工的抗争行动进行类型学分析,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农民工这一中国主要的劳工力量进行分类并追寻其力量形成的源泉,更在于对农民工阶级形成历程中的影响和制约因素予以更深层透视。基于这种考量,本文尝试将这两个概念置于农民工阶级形成的历史背景下,结合具体的劳工抗争案例对当前农民工阶级形成进程中的某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得出了若干具有推测性质的结论:

第一,按照查理斯·蒂利关于抗议台本的历史类型,农民工在现有阶段的抗争行动,尚处于从“反应性抗议”到“主动性抗议”的发展阶段。^①这主要是由于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历程尚处于初级阶段,并且其阶级形成各个维度的发展表现也呈现出不均衡性。查理斯·蒂利曾指出,无产阶级化历程包含三个重要环节:对乡村生产者的剥夺、对从农民到雇佣劳动者的乡村人口进行再分类和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Tilly Charles, 1979: 2-5)。对照这三个环节,不难发现: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历程还处于进行之中,并面临诸多特殊的困境。譬如,在国家话语体系中对农民工的称呼大致经历了从“盲流”到“外来工、外来妹”,从“打工族”到“弱势群体”,直到“农民工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主要力量”的变化。这些不同的对打工者进行意识形态定义的话语体系,实际上是不同的权力主体在对“从农民到雇佣劳动者的乡村人口进行再分类”,它构成了农民工无产阶级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不过,由于阶级话语的消逝导致了农民工问题表述中的“去政治化”与“政治化”的并存,造成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历程中“能指”与“所指”的尴尬错位,由此引发了农民工的阶级形成过程中“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巨大张力。再如,中国建筑业广泛采用的分包劳动体制(即卡兹尼尔森阶级分析框架中的社会经济组织),在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建筑工人那里发挥的是遮蔽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作用。建筑工人的阶级形成与阶级行动面临一系列不利的条件。就“结社力量”而言,他们缺乏罢工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通行的制度化抗争渠道,也没有工会等现代社会的组织支持,甚至连行会、帮会等传统的组织都缺失;就“结构力量”而言:首先,建筑工人的半无产阶级化状态使其无法获得一个完整的工人身份,他们的身份认同徘徊于农民和工人之间,影响了其阶级意识与行动能力;其次,分包劳动体制将工人分割安排在一支支小规模的分包工队中,难以通过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影响生产过程,此外,包工制度的遮蔽性,经常成功地将工人的抗争拖延到生产任务完成之后,使得工人工作现场的议价能力大大降低。在这种情况下,现阶段中国建筑工地上工人的集体行动,基本上都是围绕工资拖欠而展开的经济领域的斗争,而且是针对利益受损的防御性的斗争(潘毅等, 2010)。尽管如此,农民工的各种抗争行动,无论其组织程度是集体性抑或个体性的,无论是指向自身的消极抗争抑是指向资本和更宏大的社会结构的积极抗争,都有助于该群体阶级意识的成长,有助于社会各界关注这一群体的命运。尤其是那些具有强烈社会效应的劳工抗争“事件”,尤其能够吸引更多的有机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投身到劳工研究和劳工自救运动的各项活动中去。^②所有这些,构成了一股深刻影响社会变革的力量。而至于这些抗争能否从自发为主转变成为“有组织的阶

① 蒂利指出,在西欧现代历史上三种不同种类的集体行动即“竞争性”、“反应性”和“主动性”抗议。“竞争性的抗议”,指的是在占有差不多同等资源的群体间为了争夺同一资源而发生的冲突(比如,在不同的村庄或敌对的家族团体之间基于土地占有而形成的世仇);“反应性抗议”包括像抗税暴乱或者粮食暴乱这样一类事物,它与竞争性抗议不同之处在于,卷入冲突的各方在资源上并不平等。在反应性的抗议中,普通群众与远比自己强大的国家或市场交手。“主动性抗议”,则是在19和20世纪工业化完成不久后发展起来的,主要的抗议者不再是农民而变成了工厂的工人。工人们并不是简单地试图保护他们的传统资源不受国家和市场的新的要求的侵害。相反,他们积极地举行罢工来要求新的权利——包括每日8小时工作制、福利、普选权等等(转引自裴宜理, 2008;亦可参见 Tilly, Charles, 1986)。

② 这典型体现在近期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以及学者致国家领导人和富士康领导人的公开信中(亦可参见何海宁, 2009)。

级行动”，则仍有待于历史的发展。

第二，正如具海根曾指出的，使韩国工人区别于其 19 世纪的欧洲工人前辈的，不仅在于韩国工人的个体特征，更在于其所拥有的文化传统不同。在欧洲，手工业工人及其行会组织在型塑工人对于无产阶级化的反应方面，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正是手工业工人及其行会组织，为新生的工人阶级斗争提供了各种主要的议题、语言以及领导。手工业工人们对于无产阶级化的反应，更多的是出于社会的和道义的原因，而不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他们所关注乃是独立、对技艺的自豪以及被道德所调解的各种工作关系。正是从自身的各种职业共同体中，手工业工人们获得了各种物质的、社会的以及私人的资源，来对无产阶级化过程作出强烈的集体响应（Sewell, Jr., William, 1986:45-70）。韩国的工业化，则是在缺乏任何类似的手工业工人文化的条件下发生的。因此，新一代韩国工人在经历无产阶级化过程中，并不拥有任何令人自豪的工人阶级文化遗产。由于缺乏任何的工人阶级组织或文化资源，新的、被无产阶级化的韩国工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孤立的个体去适应其所面临的处境。如果说，手工业工人文化与组织的缺失，深刻地影响着韩国工人对无产阶级化的反应，那么，强大的、奉行干预主义的国家，则影响着韩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形式（具海根，2009；2004）。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和韩国工人的阶级形成，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阶级形成是在缺乏手工业文化遗产和阶级语言贫乏的环境下进行的。由于没有文化传统和职业共同体的资源可以凭借，^① 他们如同马克思笔下的法国农民，像一袋袋马铃薯直接从乡村来到城市和工厂。在这样一种处境下，其阶级形成注定将经历更为漫长的历程。但是，随着社会分层的凝固化和流动渠道越来越被市场和行政的门槛所抬高（大学生就业难与农民工就业难的并列，是一个显著的例子），随着打工者草根组织的发育与整体社会结构的演变（黄岩，2006；和经纬等，2009），随着重大的劳工事件的渐次浮现，他们将越来越更清醒和深刻地认识到自身的命运。这也意味着在经历了漫长的打工岁月后，农民工的阶级形成有可能突破一种前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的存在（李洁，2006：249-259）；到那时，该群体或许会在阶级形成的更高层面，通过阶级组织和阶级行动来发出自己的声音。

第三，目前，农民工的抗争行动在很大程度上还带有道德抗争和捍卫底线正义的色彩。面对强大国家机器的各种安抚性措施，^② 面对市民社会的缺位，面对“团结的文化”、“战斗的语言”的缺席，面对自身作为一个庞大的异质群体的不断分化，面对因职业流动、地域分割、行业分工与工厂控制等因素而造成的阶级分裂，这些初步带有阶级色彩的抗争行动，更多的是离散性的、个体性的，局限于某个工厂之中，未必能够引发结构性的变革。但正如汤普森在其经典之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所指出的，阶级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结构性力量和主体的能动性同时造就了这个过程。世界劳工史提醒我们，工人阶级的形成和成熟往往是在进城工作的农村工人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身上发生。从 2010 年 5 月以来由新生代农民工发动的罢工浪潮来看，沿着一条特殊的无产阶级化的道路，第二代农民工已经逐步意识到其阶级地位，并已经开始参与到一系列的集体行动中来。在愤怒和不公平感的推动下，这些新生代工人们已经在同一切话语的和结构的限制作斗争。作为新的阶级主体，他们开始起来反抗这个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反抗“迈向底线的竞争”的全球化

① 与新兴产业工人阶级——农民工不同，传统产业工人阶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工人们拥有社会主义文化传统及共同的集体记忆，他们能够策略性地运用历史上形成的关于工人阶级的意识状态话语与政治符号，来作为集体行动的文化资源与解释框架；他们可能借助那个时代的文化传统，为其群体利益的实现寻找合法性和可能性。尤其是毛泽东式社会主义的集体记忆，能够帮助工人在面临失业的危险下，克服集体动员的各种障碍。因此，对他们而言，转型期的劳工抗争资源，不仅来自国家，还来自市场（佟新，2006；Ching Kwan Lee, 2000:217-237; 2002:189-228）。

② 所谓“安抚型国家”，大致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模糊利益冲突”，即国家维持现状，就事论事地解决问题，而非推进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协调机制；二是“言行分离”，即国家更多采用政策实践来解决问题，而非按照公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本身（政策文本）来解决问题，政策文本在实践中更多不是作为标准而存在，而是作为“参照”而存在；三是“点面结合”，即国家在整体上对劳工进行“精神安抚”（意识形态宣传），在个别问题上进行“物质安抚”（如对坚持维权的农民工给予补偿）（郑广怀，2010）。

生产战略,反对他们在城市中不得不遭受的无根的生活体验,反抗加在他们身上的“农民工”准社会身份(Pun Ngai and Lu Huilin, 2010: 493 - 519)。或许,随着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深入,农民工的阶级形成路径将变得更加明朗化:在特定历史阶段,结构性力量(如“世界工厂”、“乡镇企业”)打造了中国这一特殊的新兴工人阶级主体,反过来,这一阶级主体,也终将通过自身的阶级行动与抗争事件,来参与和推动这种不合理、不公正、无法赋予他们体面和尊严的劳动的结构性变革。^①

参考文献:

- 奥林·赖特,2006,《工人阶级的力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阶级妥协》,载李友梅、孙立平、沈原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转型与发展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蔡禾、李超海、冯建华,2009,《利益受损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研究——基于珠三角企业的调查》,《社会学研究》第1期。
- 成伯清,2009,《怨恨与承认:一种社会学的探索》,《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5期。
- 董海军,2008,《“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社会》第4期。
- 冯建华,2008,《集体行动何以可能——基于珠三角非企业农民工集体维权行为的个案研究》,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博士论文。
- 郭于华,2002,《“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读书》第7期。
- 何海宁,2009,《寂寞的“可乐”,碰壁的“安全帽”:大学生维权的中国式烦恼》,《南方周末》,6月17日。
- 何明洁、古筝,2009,《工场表现与主体性表达——以城市服务业青年女性农民工为例》,《学理论》第30期。
- 胡美燕,2000,《弱者的反抗:围绕L厂一次女工集体行动的原因分析》,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硕士论文。
- 华正新,2009,《结构力量与身份认同:农民工中的青年技工》,《中国青年研究》第5期。
- 具海根,2009,《从农场到工厂:韩国的无产阶级化历程》,刘建洲译,《开放时代》第10期。
- ,2004,《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梁光严、张静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黄岩,2006,《外来工组织与跨国劳工团结网络——以华南地区为例》,《开放时代》第6期。
- ,2009,《全球化、跨国倡议网络与农民工保护》,《经济学家》第1期。
- ,2010,《脆弱的团结:对台兴工厂连锁骚乱事件的分析》,《社会》第2期。
- 和经纬、黄培茹、黄慧,2009,《在资源与制度之间:农民工草根NGO的生存策略——以珠三角农民工维权NGO为例》,《社会》第6期。
- 李洁,2006,《前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结构下的工人阶级——查克里巴蒂:〈工人阶级历史的再思考:孟加拉1890—1940〉》,载《社会理论》第1辑。
- 李军,2009,《珠宝厂血案背后的劳资困局》,《南方都市报》3月31日。
- 刘开明,2005,《全泰壹的抗争》,《南风窗》第23期。
- 区总工会、九堡镇总工会,2010,《杭州市首家工会新杭州人志愿者服务站成立》,《江干工运》第9期。
- 潘毅,1999,《开创一种抗争的次文体:工厂里一位女工的尖叫、梦魇和叛离》,《社会学研究》第5期。
- 潘毅、任焰,2008,《国家与农民工:无法完成的无产阶级化》,《二十一世纪评论》(6月号)总第107期。
- 潘毅、卢晖临、严海蓉、陈佩华、萧裕均、蔡禾,2009,《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开放时代》第6期。
- 潘毅、卢晖临、张慧鹏,2010,《阶级的形成:建筑工地上的劳动控制与建筑工人的集体抗争》,《开放时代》第5期。
- 裴宜理,《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阎小骏译,《东南学术》,2008年第3期。
- 任焰、潘毅,2006,《宿舍劳动体制:劳动控制与抗争的另类空间》,《开放时代》第3期。
- 谭深:《弱者的反抗——围绕一次搜身事件中女工集体行动的分析》,《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article/2005/10/368.html>)。
- 佟新,2006,《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一起国有企业工人集体行动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第1期;
- 王金红、黄振辉,2008,《制度供给与行为选择的背离——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利益表达行为的实证分析》,《开放时代》第3期。
- 王伦刚,2009,《农民工的非正式利益抗争及其运行机制——基于“太太讨薪队的故事”的分析》,《天府新论》第5期。

^① 重大的劳工事件,往往具有结构变革的功能(关于结构性变革与历史事件的关系的相关讨论,参见 Sewell, William H. Jr., 1985: 841 - 881)。

- 吴亚平,2006,《对农民工“组织起来、切实维权”实现形式的探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第1期。
- 徐昕,2008,《为权利而自杀——转型中国农民工的“以死抗争”》,载张曙光主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广东卷)(第六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于建嵘,2004,《当代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第2期。
- 周林刚、冯建华,2009,《农民工集体行动的策略——基于X厂3位组织精英的个案分析》,《甘肃行政学院学报》第1期。
- 郑广怀,2010,《劳工权益与安抚型国家——以珠江三角洲农民工为例》,《开放时代》第5期。
- Beverly J. Silver,2003, *Forces of labou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ris Chan King Chi and Pun Ngai,2009, "The Making of a New Working Class: A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98, June Pp. 287 - 303.
- Chan Wai Ling, Jenny,2006, *The Labor Politics of Market Socialism: A Collective Action in a Global Workplace in South China*, A thes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Philosophy in Soc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y.
- Ching Kwan Lee,2000, "The 'Revenge of History':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Labor Protests in North - Eastern China", *Ethnography*, Vol 1(2):217 - 237.
- 2002, "From the Specter of Mao to the Spirit of the Law: Labor Insurgency in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Vol 31:189 - 228.
- Erik Olin Wright,1978, *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 London: Verso.
- Ira Katznelson & Aristide R. Zolberg (eds), 1986, *Working - 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 - 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ames C. Scott,199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eung Pak Nang and Pun Ngai,2009, "Radicalization of the new Chinese working class: a case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s in gemstone industr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0 Issue 3, Pp. 551 - 565.
- Lianjiang Li and Kevin J. O'Brien,1996, "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dern China*, Vol. 22, No. 1, Jan., Pp. 28 - 61.
- Marc Blecher,2010, "Globalization, Structural Reform, and Labour Politics in China," *Global Labour Journal*, Volume 1, Issue 1, Pp. 92 - 111.
- Marc W. Steinberg,1999, *Fighting Words: Working - Class Formation, Collective Action, and Discourse in Early Nineteenth - Century Englan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ichael Hanagan,2008, "Agendas for the Study of Labor Protest," Paper presented in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Contention, Change, and Explanation: A Conference in Honor of Charles Tilly), New York, October, 3 - 5.
- Pun Ngai and Lu Huilin,2010, "Unfinished Proletarianization: Self, Anger, and Class Action amo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Peasant - Workers in Present - Day China," *Modern China*, 36(5):493 - 519.
- Ronald Aminzade,1984, "Capitalist Industrialization and Patterns of Industrial Protest: a Comparative Urban Study of Nineteenth - Century Fra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9, No. 4 (Aug.), Pp. 437 - 453.
- Sewell, William H. Jr., 1985, "Historical Events as Transformations of Structures: Inventing Revolution at the Bastille," *Theory and Society*, 25, Pp. 841 - 881.
- Tilly, Charles 1979, "Proletarianiz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CRSO Working Paper, No. 202,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ugust.
- Tilly, Charles, 1986, *The Contentious French: four centuries of popular struggl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单位:上海行政学院、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陈 昕